

俞辛焯

著作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各 俞辛焯著 市 勢力と合流して北伐を奉行しく清

朝政府を打倒する計画を決めた

この新韓起を指導するたため、孫文は廣州に

も日とも通い、ハルビンに日本を根拠地

とし、利用すべきであつたが、一九〇八年、

ランスを局長に孫文を第五卷の「遼東」

日本も一九〇七年三月、**躬耕集** 日本が

ら退去する措置を取つたので、あつた一九〇六年

月には、秘かに横濱に上陸し、孫文を援助して

俞辛焞著作集

第五卷

躬耕集

俞辛焞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目 录

上 编

孙日关系研究方法论	3
日本决定对孙中山政策诸因素探析	40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57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中日外交	115
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	139
1913 年至 1916 年孙中山在日革命活动与日本的对策	159
孙中山的“满洲借款”和《中日盟约》考释	197
孙中山与日本人士	230
孙中山与金玉均对日关系比较	256
孙中山与日本	267
孙中山图片考	288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	300

下 编

辛亥革命期の中日外交史論	323
第二革命と護国戦争期の中日外交史論	352
日中関係の過去と将来	396
中国における近代中外関係史研究の動向	403

附录：书评	417
躬耕无止境，硕果满枝头	
——读俞辛焞教授著《躬耕集》	419

上 编

孙日关系研究方法论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先行者，他的思想的形成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孙中山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和国，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共和思想，主要是受欧美的影响，在其三民主义中，包含着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从思想来源方面讲，欧美列强理应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但是，历史事实恰好相反，孙中山先后在欧美停留五年，奔走呼号，寻求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结果仅得到康德黎、咸马里等少数人的帮助。

孙中山在其三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三分之一的岁月是在日本度过的，但他的思想却很少受日本影响。只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吸收欧美文明，急速推进近代化并取得很大发展，在客观上鼓舞了他的革命运动。孙中山的共和思想是与日本的立宪君主制相矛盾的，但是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却远较欧美密切。他把日本作为革命根据地，热切期望日本支援其革命。而日本也确曾“支持”过他的革命运动。孙中山以贵宾身份正式访问过的国家是日本，与一个国家首脑会谈过的国家亦是日本。他与日本民间人士及大陆浪人关系密切，得到了他们的支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的现象呢？

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的时代，中国已沦为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英国是打开中国门户并率先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它在

中国拥有最大的殖民权益。但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逐渐替代英国，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和中国最危险的敌国。因此在中国形成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社会潮流，中国革命的反帝锋芒理应首先指向日本，可是孙中山却反而期望在日本的支援下推翻国内政敌，完成共和革命。这是与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革命目标相矛盾的。

如何解释上述的矛盾现象？这是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在以往的孙日关系研究中，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依据某种研究方法来考究这种矛盾现象，而因方法及角度相异，往往产生观点上的对立，从而引起争论。迄今，在孙日关系研究中，除个别问题（如满洲租借、中日盟约、致小池张造函、致大隈重信书简等的真伪）外，对一般历史事实基本没有大的分歧，但涉及其内在关系、性质、评价等问题时往往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为在孙日关系的研究上力求取得接近乃至一致的观点，有必要重新探讨孙日关系研究的方法论。

本文试图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重新探讨孙日关系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孙日关系。

一、孙中山的对日认识

研究孙日关系，首先要弄清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孙中山极其重视日本的明治维新，他最早谈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文章是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其中他写道：“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①这里，孙中山对维新后的日本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此后，他又多次谈到明治维新，他还说：“日本维新是中国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①对于日本来说，明治维新是具有双重性质的社会变革，一方面实行近代化，建成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外侵略朝鲜和中国。这种双重性自然会反映到孙中山的对日认识上，即他一方面主张向日本学习，另一方面批判其对外侵略行径。

在以往的孙日关系研究中，并不是全面研究孙中山对日认识的这两个方面，而是主要研究他对日本侵略中国是否有系统而明确的认识等问题。这当然是孙中山对日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全部。因此，在论及孙中山对日本的期望与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认识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应该考虑到孙中山在期望中包含着学习和吸收维新后日本近代化经验的因素，并应将两者加以区别。

当时，日本社会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孙中山的对日认识也是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要真正认识一个国家，必须从这个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着手，对不谙日语的孙中山来说，全面而有系统地认识日本是不可能的。即使说 1919 年后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已发生根本转变，其认识也仍然是不系统、不全面的。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苛求于孙中山。

孙中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认识也是如此。他不可能深刻地认识日本从 1874 年出兵台湾开始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以及侵略政策的决定、执行过程与其国内政治、经济、舆论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所以说孙中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认识也是不系统、不全面的。

但是在日本是否属侵略国家，日本是否在侵略中国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孙中山的认识是明确和鲜明的。孙中山始终揭露和批判日本侵略中国并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孙中山 1894 年 12 月在檀香山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即在该会的章程中指

^① 《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第 365 页。

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①这里揭露了各列强尤其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侵略和瓜分中国的罪行。其后，1903年9月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又揭露了日本对福建和浙江一带的侵略。^②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孙中山又主张联合法国抵抗日本。1910年8月日本侵吞朝鲜后，孙中山更提高了对日本侵略的警惕性。1911年2月3日他在致宫崎滔天的信中尖锐地指出：“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③同月15日的信中又指出：“惟英美两国政策皆疑日本有大野心，欲并支那者也。弟……亦不能不疑贵国之政策实在如是。”^④同年8月在致咸马里的信中也提出了日本对中国开战的可能性。^⑤这些事实说明，孙中山不仅对日本侵华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对日本侵华的新动向亦抱有相当的警惕。因此，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担心日本出兵干涉^⑥，故不立即回国，在美国和欧洲采取了牵制日本出兵的外交措施。1917年1月他在《日支亲善之根本义》一文中，提出了日本追随欧美列强在中国扩大殖民权益的事实。^⑦同年5月，他又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⑧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孙中山对日本的侵略尤其是对中国领土的侵占有明确的认识。

日本和欧美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它们侵略中国的产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即致力于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1913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0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8~22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8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2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2~533页。

⑥ 1913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⑦ 《大阪朝日新闻》，1917年1月1日。

⑧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5页。

年春，孙中山访日时，便呼吁废除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等条约，并希望日本予以协助。^①1917年1月1日孙中山在《日支亲善之根本义》中，再次希望日本协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②这表明孙中山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有明确的认识。

孙中山不仅对日本的侵略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就日本政府及军部对他和革命党的政策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欧美回到上海时，曾对宫崎滔天等日本大陆浪人谈到他在1907年和1910年两次被逐出日本之事，表示“我非常怨恨日本”，日本当“我们主动地要握手时缩回其手，对己有利时则要来握手”。^③又称自己“常常受到其政府的苛酷待遇，对此并非没有不满”。^④1912年2月3日，孙中山在南京与森恪谈到“满洲租借问题”时又说：“日本是疏远我们，不接近我们的。起义爆发之初，我便提及赴日之事，但日本官宪不许我入境。因此，我以为日本政治家没有容纳我们的度量”。^⑤孙对日本一时援助他的目的也有明确认识。他就1916年春反袁时援助他之事说，其目的是“图伸张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而又不欲中国民主主义者获得中国政权”^⑥。这些不满和愤慨，说明孙中山对日本为侵华而利用他的策略是有正确认识的。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分析，孙中山虽未全面地、系统地揭露和批判日本侵略中国，但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是有明确认识的，这是孙中山认识日本的最本质的方面。

然而，孙中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言论又是具有双重性的，尤其是1913年访日时的言论更是如此。孙中山说，日本与俄国不同，

①《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8页。

②《大阪朝日新闻》，1917年1月1日。

③在上海宗方小太郎之函，1911年12月30日到，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④1911年12月27日在上海的本庄繁少校致参谋总长电，第155号。

⑤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6页。

“与我国利害相关，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从历史上观察之，彼为岛国，我为陆国，绝对不相侵害。纵近年来不免有侵略之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们最要原谅日本的。”^①孙中山在评价日本对维护东亚和平所起的作用时说：“现在拥有维护东亚和平力量的只有日本……以日本的力量能维护东洋的和平。”^②他接着又说，“所有日本人都诚恳地希望东洋的和平，爱我中国”^③，日本“朝野上下，莫不表示真诚与我国联好之意”^④。他呼吁中国人“对于日本人之心理，亦需要变愤恨而为亲爱”^⑤。

孙中山还主张中国与日本提携和联合。他说：“亚洲大局维持之应[责]任，〈应〉在我辈黄人。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同种同文，对于东亚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补助进行。”^⑥访日归国后他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也称：“此次游日，向其朝野官民陈说中日联和之理，双方意见极为浹洽。”^⑦

孙中山自1895年1月准备广州起义至1924年11月在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讲演，始终对日本抱着期待，希望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人士支持其革命，要求日本提供贷款和武器，并以向日本提供小国的权益作为其代价。

孙中山对日本认识的双重性，有时在一篇文章中亦有体现，1917年的《中国存亡问题》和《日支亲善之根本义》这两篇文章就是如此。《中国存亡问题》是为阻止和反对北京政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写的。当时日本也是反对北京政权参加大战的。孙中山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致的一面。因此，孙中山在文中称赞了日本反对英、法、俄等国劝北京政权参战的举动，并说“从

①《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27页。

②《论日中两国在东亚的关系》，《支那》第4卷第5号，第3页。

③《支那》第4卷第5号，第6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2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7页。

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页。

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1页。

公平之观察，以批评日本当时之态度，可谓第一为中国谋其利害，而后计日本之利害（此时中日利害相同，自不待言）。以此友情，救中国之危，而措诸安定”^①，“中国惟与日本同利同害，故日本不能不代计中国之利害，而进其忠言”^②。孙中山在文中回忆和比较了“二十一条”交涉时期和第三次革命时期日本对袁的政策后说：“以此二者比较而观，可以知日本于中国不必以侵略为目的，其行动常为中国计利而非以为害。”^③但孙中山在文中也没有放过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揭露英、法、俄对中国侵略的同时，又严正地指出了“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④，并且说日本也如同英、法、俄，是非正义的国家。此种双重认识在《日支亲善之根本义》一文中也能看到。孙中山在此文中写道，在中国具有新思想的人们为改革中国政治，增强中国的国力，对先进的日本抱有很大的希望。^⑤但另一方面又指出，日本追随欧美列强的利益均沾、机会均等政策，肆意扩大其在华权益，对此中国人非常不满，并畏惧和怀疑日本。^⑥

如上所述，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有时严正揭露和批判日本的侵华行径，有时又说日本对中国没有侵略的意图，矛盾之处较多。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和解释这种矛盾现象与这种对日认识及其对日的期望呢？

二、两种研究方法

分析和解释上述矛盾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思想认识论的

①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6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5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64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5页。

⑤ 《大阪朝日新闻》，1917年1月1日。

⑥ 《大阪朝日新闻》，1917年1月1日。

研究法，二是国际关系论的研究法。前者被学术界广泛采用，后者则较少被采用。

思想认识论认为，一个人的言论反映他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因此，思想认识论研究者认为，孙中山的对日言论反映了他对日本的认识，他对日的模棱两可的双重性言论正是反映了他对日本认识不清，如认识清楚则绝不会发生这种矛盾现象。这是思想认识论研究法的基本观点，以此观点来进一步说明认识与行动、认识与态度等诸问题。

国际关系论研究者认为，认识与言论有时一致，有时则要因国际环境和国内政局的变化，两者又不一致，甚至相反。这就是说，两者一致也好，不一致甚至相反也好，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在不同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国际关系中，国与国、国与某一个集团之间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和利益，往往会超越对对方本质的认识，结成协作关系。孙中山代表中国革命党，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是革命党与日本之间的国际关系。既然孙日关系属国际关系范畴，那么应以国际关系论的研究法来研究孙中山对日认识的双重性。在双重性中，问题的症结在于孙中山对日本的称赞，尤其是 1913 年春访日时所说的话。此时的孙中山为什么会说那般话呢？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一是作为日本贵宾在正式访问日本的情况下，公然揭露和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径，从外交礼节上讲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从外交礼仪上说，尽量赞美访问国是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惯例。二是孙中山访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振兴中国产业，建设中国铁路，在日本筹集巨额资金，因此压制留日青年学生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以便与日本结成“友好”关系。三是孙中山要和日本、德国联合起来，对外抗拒英国，对内与袁世凯抗衡。这个方针是孙中山和桂太郎在政治会谈中秘密商定的。此事虽因桂太郎之死而未能实现，但无疑影响了孙中山的对日言论。由此可见，孙中山赞

美日本是为了达到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目的。但是，如上所述，这时期孙中山对日本侵华依然有明确的认识。3月23日离开长崎归国前夕，他说出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关于中国的将来，能够制中国于死命者必为日本，对此余确信无疑。”^①

1917年孙中山发表的《中国存亡问题》因称赞日本而著名。如上所述，孙中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与日本共同阻止北京政权参战。为达到这个目的，孙中山极力称赞日本反对北京政权的举动。尽管如此，文中还是指出了日本占据中国国土百分之五的侵略事实。

以上事实说明，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他在1913年和1917年特定的时期和就特定的问题称赞日本，并不是由于对日认识不清，而是为达到当时政治、经济、外交目的的辞令，从国际关系论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外交手段，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中屡见不鲜。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孙中山的政治个性。孙中山坚信自己的革命理想一定会实现；为实现其理想，他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手段和方法。这一灵活性的限度，在对其理想的实现有利时，往往被大幅度地超越。正是由于他的对日言论有时大幅度地超越了灵活性的限度，便被采用思想认识研究法的学者追究为对日的认识问题。

在历史和现实社会的现象中，往往是虚实混淆，在国际关系中尤其如此。孙中山为实现一时目的和最终的理想而称赞日本的外交辞令是虚，批判日本侵略是实，若不区分这种虚实，未免对政治家孙中山理解不足。政治家的一大特征是，既有政治原则又能随环境和政局的变化而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以让步和妥协来达到自己或集团的政治目的。因此，政治家对一个问题或者对一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0页。

个事物的看法，有时说真心话，有时说违心话。孙中山对日言论的双重性正是反映了政治家的这一性格特征。采用国际关系论的研究方法能使我们准确地解释孙中山对日认识的双重性。

以下进一步探讨孙中山的对日认识与对日态度、政策及行动的相互关系。持思想认识论研究法的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决定了对日态度、政策和行动。于是断言孙中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本质认识不清，而且不系统、不全面，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从而对日本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甚至糊涂。因此，孙中山对日本抱有幻想，力图获得日本的支援，以达到革命的目的。自1919年起，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及过去对日关系的教训中，使他的对日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明确地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本性。由于认识的变化，他的态度、政策和行动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放弃了幻想，不再期待日本，也不再要求日本支援，并开始严厉批判日本。这一观点，从思想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反映了孙中山的认识和行动一致的侧面。但不能完全说明其认识和行动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如前所述，孙日关系既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关系，那么另外的一个侧面，则只能用国际关系论研究法来解释。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明确认识，而且其认识是理性的。既然如此，孙中山为什么又要求日本援助呢？这种矛盾又做何解释？笔者在这里力图以国际关系论研究法来进行解释。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集团——革命党与日本的关系，1912年1月至3月是其革命政权——南京临时革命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在此关系中包含着孙中山个人的因素。革命领袖往往代表革命集团，所以讲，孙日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国与国、国与革命集团的国际关系是在国家间或国家与集团间的利害关系中产生的。这种利害关系通常又是由军事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世界秩序等诸因素组